

第一章

折射时代光芒的生平

大凡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其生平经历和思想往往留有时代和历史的鲜明印记。在探讨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和经济思想之前，我们先对他折射时代光芒的生平作一番简略的介绍。

第一节 从少年中举到康门高足

1873 年 2 月 23 日，即清同治十二年阴历正月二十六日丙午，梁启超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梁启超出生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败，矛盾重重，病人膏肓，行将就木的时期。这是一个动荡变化的历史时期。在“同治中兴”的表面平静下，社会内部的破坏力量正在加速积聚，灼热的岩浆很快就会从火山口汹涌喷薄而出。

就在梁启超出生的 1873 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世界，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资本集中进程加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为转嫁危机，摆脱困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扩张侵略。在中国，随着两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已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翼护下，外国商品开始在华倾销，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迅速瓦解，代表新生产力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已经出现，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尖锐。为维护日益颓败的封建统治基业，清政府与西方侵略者沆瀣一气，已完全勾结在一起。

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诩的中国为什么会被历来视之为“蛮夷之邦”的西方国家打得无力招架呢？中国的有识之士经过沉痛的反思，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老大帝国已经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为使中国重新强盛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林则徐、魏源开始，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试图向西方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到梁启超出生的时代，学习西方的思潮已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单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到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已公然提出改革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制的主张。如郑观应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易言》一书中有一篇《论议政》不仅具体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而且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捍格之虞，臣民混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豫期者矣”。其后，在《盛世危言·议院》中，他进一步主张“中国要‘富国强兵’，必自设立议院始”。

上述时代和社会思潮的特点，自然对以后梁启超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他而立之年所写的《三十自述》

中，就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和中外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① 这生动地反映出梁启超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

梁启超的家乡新会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端，熊子乡是西江入海口外的一个小岛，由江海的泥沙冲积而成。所以，后来梁启超自称是‘中国极南之一岛民’^② 这片冬日草木不凋的亚热带土地，富饶美丽，具有光荣的爱国斗争传统。南宋末年民族英雄陆秀夫、张士杰壮烈殉国之处，就在新会县南端的崖山。十九世纪以后，这里最早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得尤其尖锐激烈。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在近代之初就向西方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精神和品格。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中，除严复外，其余三个都出生在珠江三角洲这片热土上，距梁启超的家乡都不远。由新会渡江而东不足五十公里，就是香山县（今中山市），那里的翠亨村，便是孙中山的故乡。由新会渡江而北约五十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

^② 《哀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

公里，就是南海县（今南海市），那里的银坑乡苏村，便是康有为的故乡。由南海县越广州渡珠江而北约二十五公里，就是花县，那里的花山福源水，便是洪秀全的诞生地。面积并不大的珠江三角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的风云人物都诞生在那里，真可谓是地灵人杰。不过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并不是本书探讨的内容。

茶坑村大部分居民都姓梁，梁姓在当地有较大的势力。广东的梁姓，北宋时自安徽寿州移入，始祖为梁绍。据臧勳和《中国人名大辞典》载：“梁绍，宋寿州人。少孤，奉母孝。母卒庐墓，手植松柏，有甘露芝草之异。后为广东提刑司干官。苏轼南还，见而重之，署其亭曰甘露，林曰瑞松。”看来，广东梁姓的始祖同大诗人苏东坡还有一段不浅的交谊。梁绍居南雄珠玑里；绍传三代，至梁南溪始迁新会县大石桥；再传十二代，至梁谷隐方定居茶坑村；又传十二代，至梁维清，他就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极为崇敬的祖父了。

梁维清（1815—1892），字延后，早年家境贫寒。其父死后，兄弟八人分家，仅得薄田几分，砖房一间。为摆脱困境，梁维清苦读多年，总算中了秀才，后来还当上了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教谕”。教谕虽然只是个八品芝麻官，但在茶坑村，自然也算是个人人尊敬的人物了。与此相应，家境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和梁维清一起生活凡十九年。梁维清持家勤俭，待人宽厚，热心乡间公益事业，重视对儿孙的教育。梁启超自幼聪慧过人，因而在八个孙子中，梁维清最喜爱的就是梁启超，对他的教诲也最多。梁启超两三岁起开始识字，四五岁时即在祖父及母亲的指导

下读《四子书》和《诗经》。及晚，祖孙两人抵足而眠，梁启超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祖父讲故事。梁维清深受宋明理学熏染，重视义理名节之教，经常用圣贤先哲的嘉言懿行教诲梁启超，尤其喜欢谈论宋、明亡国后的历史掌故。作为梁启超最早的启蒙老师，梁维清对梁启超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梁启超日后忧国爱民的人生态度和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人生观的形成，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祖父对他的谆谆教诲。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1849—1916），字莲润，是梁维清第三个儿子。梁维清对儿子期望甚高，希望他能通过科举求得功名，进入仕途。怎奈梁宝瑛屡试屡北，连个秀才也未考上，遂绝意进取，在茶坑村的私塾里当了个教书先生。执教之余，还得耕种家中的几亩薄田。梁启超幼年时，全家的生活甚为清贫。

梁宝瑛洁身自好，热心乡间公益事业，课子甚严。梁启超六岁后就在父亲的私塾中读书，父亲对他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梁宝瑛去世后，梁启超对父亲的为人处世以景仰的语气评价道：“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识礼，相夫教子，以“贤孝”闻于乡里。赵氏生有四子二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五岁时夭折，四子启业，两女不知其名。生

启业时，赵氏因难产死亡，时梁启超十五岁。

生母赵氏对梁启超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最初教他识字，而且注重对他的品德教育。梁启超自幼聪慧过人，父母及祖父母对他钟爱有加，甚少责骂，更不用说打了。六岁时，梁启超因说谎，母亲赵氏一改终日含笑的面容，将他翻伏在地，力鞭数十，教训道：“今说谎者，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日，此好说谎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① 这次责打，对幼年梁启超是个极为深刻的教育。成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犹深情地说：“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梁启超天资聪颖，加以祖父和父母的悉心教导，“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② “神童”之誉很快在他的家乡传开。于是，梁家数代未竟的愿望自然都寄予梁启超身上，希望他科第得意，光宗耀祖。

1882年11月，刚满九岁的梁启超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往省城广州应童子试。这次虽未考中，但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见了世面，开了眼界，接触到了在乡间从未涉及过的学问，也增长了科举考试的临场经验。

1884年初冬，梁启超再次赴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

① 《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

② 《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

③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

士弟子员。十一岁的童子中秀才且名列前茅，这在科场中自是佳话。主考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惊喜之余，亲自召见，试以文艺，大为叹服，并应梁启超之请，为他的祖父梁维清七十大寿写了一篇祝寿文。当梁启超春风得意回到家乡，将学政的祝寿文端悬在室，全家欢欣若狂自不必说，整个茶坑村也喜悦异常，庆幸“神童”为全村带来了荣誉。一时间，茶坑村男女老幼，络绎前去梁家祝贺，梁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次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广州著名的官立学校学海堂学习。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设，旨在为秀才们提供一个进一步深造的场所。梁启超先后从学的山长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均以汉学见长，在学界有一定名声。当时，和学海堂并称的还有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合称广东五大书院。1888年，十五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是菊坡、粤秀、粤华三个书院的院外生。当时，这些华南最高学府均标榜乾嘉学派开创的汉学，注重词章训诂、考据辨伪，对一般士子视为进身之阶的帖括之学不太重视。几年的学习生活，梁启超刻苦攻读，奠定了他一生深厚的传统学术根柢。学海堂每季度考试，他四季都考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①。因考试优异所得的“膏火”即奖学金，他大多用于购书，每当学校放假，他总是背着大捆新书回家。

1889年9月，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一试中举，在这榜录取的一百名举人中名列第八。中举是

林慧儒、陈侣笙：《任公大事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页。

封建时代科举道路中的关键一步，因为只有取得举人资格才可参加进士考试，考中进士后即可授以官职；即使落榜，按班次也可选授知县，补用教职，进入仕途。这对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梁启超来说，真可谓少年得志了。

这一届广东乡试的主考是贵州人李端棻，副主考是福建人王仁堪。两位主考对梁启超的才华品貌都极为赞赏。发榜后，李端棻即请王仁堪作伐，打算将自己尚未出阁的妹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而王仁堪此时亦暗想将梁启超招为东床快婿。只因李先开口，且李的地位又在自己之上，王仁堪只得压下自己的想法，连称李有眼光。

两年后，梁启超在父亲梁宝瑛的陪同下，去北京与名门闺秀李蕙仙完婚。李蕙仙知书识礼，教养甚好，婚后随丈夫回新会老家，操持家务，孝敬老人，出入乡里，没有官家小姐的架子，村里口碑甚好。虽然过惯官宦生活的她不适应乡间的清苦生活，后又回到北京，但她对梁启超的关爱和帮助，使梁启超感激终生。尤其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达十四年，给家庭带来极大拖累，出于对丈夫的理解，李蕙仙从无怨言。因而，梁启超称他和李蕙仙是“美满姻缘，百年相爱”。1924年9月，李蕙仙因病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在《祭梁夫人文》中写道：“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劳于外，君煦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①对妻子的情意和丧妻之痛溢于言表。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022 页。

然而，就在梁启超中举后不久，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的转折。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落榜。回家途中经过上海，在书坊购得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并接触到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出版的各种西书，始知世界之大，并有感于西方国家的强盛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同年秋，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的学生陈千秋。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惊世骇俗的思想言行，并告诉他康有为上书请变法未果，刚从京师回广州。求知欲极强的梁启超听了十分兴奋，即请陈千秋带他引见康有为。后来，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生动地记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康有为时的情景：“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初次见面的交谈，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冲击，以至于“竟夕不能寐”。于是，第二天梁启超再度造访，请教为学方针，康有为“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从此，梁启超决意舍弃致力多年的旧学和人生理想，离开学海堂，拜师康有为门下，聆其教诲，整整四载，终于从一个热衷功名利禄的封建士子变成一位心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维新志士。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宦宦家庭。1876年，师从当时声望甚高的今文经学家朱次琦，受学于九江礼山草堂，三年苦读，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1878年，结识京城名士张鼎华，相处莫逆，受到政治启蒙。次年，康有

为游历香港，目睹昔年荒岛经英国殖民者近四十年的经营，已高楼林立，街市繁华，“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夷狄视之”。于是，他在香港购买世界地图，选购西书，产生了进一步了解西学，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思想出现重大转折。后来，他上京赶考，途经上海，见租界的繁华和变化比香港还要大，而所经内地城市，那怕是“首善之区”有着数百年都城历史的北京，也都衰败不堪，生气全无，这就更坚定了他讲求西学、学习西方的信念。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搜集到的各种西方政治社会和自然科学著作，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884年，他将儒家的人道主义、今文经学中的历史进化观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结合在一起编著《人类公理》（1902年，康有为以此为蓝本完成《大同书》）设计出一个“天下为公 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之世”。1890年，康有为结识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经学大师的廖平。受廖平的启发和影响，康有为对今文经学进一步加工改造，将学术创新与政治改革相结合，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变法维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882年和1888年，康有为曾两度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中举。1888年赴京期间，他有感于内外交困，国势危急，而统治者却骄奢淫逸，结党营私，贪污纳贿，纲纪败坏，加以这一年黄河泛滥，自然灾害遍及全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热血沸腾，不顾布衣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朝廷成规，披肝沥胆，撰成《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罪己诏及时图变折》，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要求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

第一书》。这次上书虽未能到达皇太后和皇帝手中，但在京师却造成极大反响，奏折不胫而走，广为传抄，康有为从此成为著名人物。

为了培养人才，共图维新大业，康有为深感须从教育入手。1890年，康有为全家迁居广州，翌年春即在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就是在万木草堂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

康有为不仅是变法维新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在中国，他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予以实践。万木草堂的教育注重德育，要求学员“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具体内容十分丰富。智育教学上，摒弃当时流行的四书五经、陈腐八股，而是以孔学、佛学和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课堂上，康有为纵论中外古今，每讲一事，必究其沿革得失，并举欧美的例子以为佐证。万木草堂注重启发式教学，强调自学和讨论，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学员的笔记和学习心得每半月呈交一次，康有为都详加批点。体育被列入教学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也是由万木草堂开其端的，项目有军事体操、野游等。

在万木草堂，青年梁启超勤奋学习，如海绵吸水般地吮吸新的知识，尤注重写读书笔记。他还注重社会实践，学习期间数度外出到佛山、东莞等地讲学，传播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梁启超很快就成为万木草堂的高才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并参与《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等书的著述活动，逐渐变为康有为维新变法活动的得力助手。

对于这位得意门生，康有为是寄予无限期望的。梁启超 1891 年去北京与李蕙仙完婚，康有为和万木草堂的同学送他登程，康有为的赠别诗《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其一云：“道入天人际，江门风自存。小心结豪杰，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岂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激荡上天门。”^①充分表现出康有为对这位高足的殷切期许和倚重。

然而，此时这位风流倜傥的“贾生”梁启超是否意识到，在人生道路前面，迎接他的将是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呢？

第二节 变法维新的弄潮儿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变法维新思潮勃兴并付诸实践的年代。在席卷神州的维新大潮中，梁启超追随其师康有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1894 年 3 月，梁启超来到北京，一则为广求维新同志，再则也为明年的会试作些准备。他住在琉璃街新会会馆，与麦孟华、夏曾佑等研讨新学，互相砥励。8 月，发生了顽固派官僚给事中余晋珊等人上书弹劾康有为的事件。余晋珊给康有为安上“惑世诬名，非圣无法”的罪名，请求朝廷查禁《新学伪经考》并对康予以严惩。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立即命令两广总督李瀚章“依议办理”。当时，康有为正在广州。在京的梁启超闻讯立即奔走营救，托人说情，总算使事情平息下来。通过这件事情，梁启超结识了一大批京城名士，为

^①《康南海诗集》卷四。

以后的维新变法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梁启超为营救康有为奔走疏通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政府的军队在朝鲜战场和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战火很快就延烧到中国的土地上。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却不闻不问，依然醉生梦死，侈靡无极。为筹办慈禧六十大寿，京城一派虚假的太平景象。梁启超眼见时局维艰，深感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亡图存，于 11 月怀着满腔悲愤回到广东。

1895 年 3 月，梁启超与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康有为进士及第，梁启超却名落孙山。但此时梁启超早就不以个人的功名利禄为念，而拳拳于爱国救亡、变法维新的大业。

4 月中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舆论哗然。康有为、梁启超立即鼓动广东、湖南两省的会试举人联名上书，反对与日议和。接着，梁启超又与康有为一起，邀集十八省会试举子 1300 人在松筠庵集会，决定各省举人联合上书，公推康有为起草。康有为用一昼两夜的时间写出万言书，向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由梁启超、麦孟华分头誊清，于 5 月 2 日递送都察院。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公车上书”。汉时，应试者用公家车马接送，后世遂称举人入京参加会试为赴公车。梁启超后来写有《戊戌政变记》，称这次“公车上书”是老大帝国觉醒的标志，“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①。万言书虽未到达光绪皇帝手中，但它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拉开序幕。

幕。对梁启超来说，“公车上书”也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开端。

经过“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认识到要维新变法必须要聚集力量，而要聚集力量必须要组织团体，扩大舆论宣传。当时的北京除了一份专门登载诏令谕旨的《京报》外，还没有中国人办的其他报纸。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每双日出刊，印千余份，附《京报》发行分送朝士不收报费。《万国公报》除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外，每期还有一篇论说，多出自梁启超之手，鼓吹变法维新。通过舆论宣传，变法维新活动得到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康有为又发起组织强学会。参加强学会的，除维新派人士外，也有一部分政府官员，共二十多人。陈炽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强学会几天集会一次，举行演讲，鼓吹变革。12月，康有为、梁启超又将《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梁启超担任主笔。通过梁启超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强学会在京城开明士大夫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上海强学分会，创办《强学报》，张謇、黄遵宪等江浙维新名士相继入会。京、沪呼应，变法维新的呼声日见高涨。

对于维新活动的不断发展，封建顽固派是不能容忍的。1895年底，因御史杨崇伊上奏，《中外纪闻》被勒令停刊。旋即，1896年1月，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也被强令解散。

恰在此时，黄遵宪、汪康年等打算在上海办《时务报》，意欲请梁启超主持笔政。康有为也支持自己的得意门生到上

海去办报。于是，1896年3月，梁启超离京赴沪。经多方筹划，以强学会上海分会余款1200元和黄遵宪捐助的1000元作经费，8月9日，《时务报》正式创刊。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每十天出刊一期，每期二十余页，以介绍中外时事、开启民智、鼓吹变法维新为宗旨。该刊大量刊载维新志士的文章，尤以梁启超的撰述为多。至1898年8月8日停刊，《时务报》共出六十九册，几乎每册的论说都出自梁启超之手。

《时务报》是维新志士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对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务报》刊登的文章不仅介绍西方文化，传播维新思想，抨击腐败时政，反映民众呼声，而且语言通俗，文笔流畅，有很强的吸引力和鼓动性。尤其是梁启超所写的文章“笔端常带感情”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因而报纸的发行量不断上升，最高达一万七千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从此，梁启超声名雀噪，自通都大邑至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有“新会梁氏”。同梁启超联系甚多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写道：“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现在上海开办了一个报纸，叫做《时务报》，是维新党的机关报。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帝国。”

然而，《时务报》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经理汪康年是洋务派要员张之洞的亲信，《时务报》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日趋激烈的言论，张之洞意有不满，指使汪康年进行干预。年少气盛的梁启超自然不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六》。
《留华四十五年纪》。《戊戌变法》第3册，第560页。

甘掣肘，屡屡同汪康年发生冲突。正好这个时候，黄遵宪调任湖南按察使，邀请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于是，1897年10月，梁启超辞去《时务报》主笔，前往湖南。

当时，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各地鼓吹变法维新的报刊纷起，维新变法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遍及全国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湖南是最为有声有色的一个省。以巡抚陈宝箴为首，地方官吏中很多都有维新倾向，主张开通社会风气，培养维新人才，推动朝廷变法。梁启超到长沙时，时务学堂已招收到四十名学生，并购置了相应的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作为总教习，梁启超首先制订十条《学约》：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师生共勉，“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接着，又主持制订功课章程。规定学生先学“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中外史志及数学等；之后再学“专门学”，包括公法、制度、理化等。他为学生开列的数十种必读书目中有相当部分是西学书籍如《万国公法》、《万国史记》、《格致汇编》、《几何原本》、《化学鉴原》等。梁启超强调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勤加思考，多加讨论，还要关心国内外大事。他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多阅读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学生课卷涉及这方面内容，必详加批语。

时务学堂开办后，共招生三次，招收学生两百多人。在梁启超等人的培育下，时务学堂的学生迅速成长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维新志士。梁启超亲自授业的四十名学生，后来大多献身于维新和革命事业，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护国反袁的元勋蔡锷将军就是时务学堂的高

才生。

湖南维新思潮的勃兴，使当地的顽固守旧人士惶恐不安。于是，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封建劣绅便以卫道士自居，对维新派大肆攻击，梁启超当然更是矛头集中的对象。他们上书巡抚陈宝箴，要求斥逐梁启超，整顿时务学堂。而这个时候，梁启超却因操劳过度，体质虚弱。于是，梁启超于 1898 年 2 月离开长沙，回上海休养治病，并继续鼓吹维新变法。

1898 年 3 月，应康有为之召，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此时，变法维新已呈现新的局面。是年初，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已上达光绪皇帝，光绪阅后大受感动，传谕总署，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送，不许阻隔。于是，1 月 29 日康有为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维新的纲领：“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黽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励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不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